

編後語

今年是羅爾斯 (John Rawls) 誕辰百年，亦是他所著的政治哲學經典《正義論》(A Theory of Justice) 出版五十周年，敝刊專門組織了一個紀念專輯，與讀者一起思考正義理論的時代意義。中國思想界對《正義論》當然並不陌生，但至今仍有論者質疑，羅爾斯的自由主義理論與中國現實並不相關。周保松指出，羅爾斯的理論雖然不能直接挪用到中國語境，卻能為社會轉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，如建構自由主義理論、追求個人生命價值等。李敏剛認為，羅爾斯對於司法釋憲所能扮演的捍衛公民權利的角色過於樂觀，並以香港作為例子，說明即或有成熟的普通法傳統，在欠缺民主選舉作為憲政秩序的前提下，法院的「公共理性」依然無法得到彰顯。謝世民認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蘊藏豐富的思想資源，可資探討實踐「轉型正義」時衍生的法律和政策問題；重要的是在施行相關安排時，慎防淪為昔日受害者的報復行徑，違背公平正義的精神。郭志指出，《正義論》中的兩條正義原則，雖然對當代新自由主義背後的邏輯有所批判，如認為社會必須講求互惠共利、正義是評判社會制度的重要準繩、弱勢群體利益需要優先照顧等；然而，在經濟領域內，羅爾斯並沒有針對企業行為提出明確的規範原則，未能為監管當今影響力無遠弗屆的科網巨頭提供參照。

本期刊出的四篇學術論文，探討的論題與時代雖然各不相同，卻無不體現一種跨國的比較視野，饒富啟發意義。新冠疫情爆發以來，各國防疫策略的成效榮辱互見，孫硯菲以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方法，通過探討幾個防疫表現最佳國家的案例，揭示國家能力、政體性質和文化等因素均非抗疫成效差異的關鍵，國家決策能力和政權合法性顯得更為重要，具體涉及領導人的危機感知意識和能否採取相應的防疫措施。1990年代以來，中國大批中、高級官員被派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受訓，究竟「市長班」對於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官員提升治理績效有沒有正面作用？劉宏和王婷艷的調研結果顯示答案是肯定的；「新加坡模式」最吸引學員之處是實用的治理經驗借鑒，而非其意識形態。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雖然遠在東歐發生，惟其伴隨而來的震盪卻在改革之初的中國社會掀起餘波。蔣華杰指出，事件成為中國決策層在思考改革問題時的「制度鏡像」，「鏡鑒蘇東」的思維從此左右了往後的改革路徑。1950年代末，在中國凱歌行進的大躍進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頗大關注，一度為急於擺脫國家貧困的越南勞動黨領導人借鑒仿效，並雷厲推行。游覽認為，在北越上演一年多的「躍進」戲碼雖然取得一定的經濟成果，但隨着中國大躍進的負面消息陸續浮現和中蘇關係惡化，最終徐徐落幕。